



胡漢民講演

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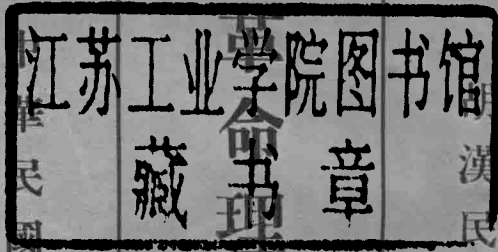
中央政治會議
武漢分會

宣傳叢書第二種

十七年十二月印行

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

宣傳叢書第二種



漢民講演

論與革命工作

十七年十二月印行

發行宣傳叢書要旨

爲什麼發行「宣傳叢書」？

我們都知道，訓政開始最重要的是「建設」。在「要建設」的呼聲中，我們極容易專注意「物質的建設」，忽略「心理的建設」。物質的建設，是求我國富強的基礎，是救貧救弱的唯一方法，如果不是一個瘋狂人決不會說不重要。可是同時要知道，革命的建設還要一個建設的革命。建設革命的目的，即是除物質的建設之外，還要心理建設，而且要重視心理的建設，換句話，如果沒有心理建設，物質建設縱如何的成功，還不算革命的建設，未達到革命建設的目的，則所建設起來的新國家，縱或是一個富強的國家，也不是「三民主義的國家」。

三民主義的國家怎麼樣呢？

簡單的答覆。三民主義的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截然不同

。是要真正的實現『民有民治民享』，尤其要緊的即是人人都了解主義，因此，訓政時期最重要的工作，除物質建設之外，還應該特別的努力，使民衆接受主義的訓練。那末，才能一步一步的由三民主義的路走到三民主義的新國家。

本會成立宣言，即首重心理建設，本會主席暨委員尤無不以統一意志爲樹立革命建設的基礎，本股職司宣傳，當然所負的責任——心理建設的責任——很大。所以本這個意思，擴大各項宣傳工作，因有本叢書的發刊。搜羅會內外名論，印成小冊，分送各級黨部各團體各機關，希望在革命的建設進程中，有些小小貢獻。如果由此能夠引起全國同志對心理建設的注意，使物質與心理的建設並重，得由此建設起三民主義的國家來，那末，更是我們所切望的了。

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宣傳股誌

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

胡漢民

(在南京市第十區黨部講演)

各位同志，今晚是本市第十區黨部第一次舉行演講會，兄弟得以參加，甚為高興，因為以前在廣州，在上海，曾經參加過區黨部的演講會，我在南京參加區黨部的演講會，今天還是第一次呢，大家同志常常聚會交換意見，實在是件極有意義的事情，第十區黨部的同志，大都是在中央服務的職員，對於黨的見聞思考，比較一般區黨部黨員，一定更多，那麼舉行這種會，便更有意義了，可惜今晚第一次舉行，而出席的人便不見得十分多，不無遺憾，凡是做黨的工作的人，工作之餘，一定要常常的研究理論，然後他所做的工作才能完全合乎理論，工作好比夜行，理論就是燈火，有了燈火照着，夜行才有把握，一面工作，一面研究理論，理論固然領導了工作，而工作中會生出新的理論來，那就格外相得益彰了，工作固萬不可以離開理論。也萬不可丟開事實，去說空話，同志中工作之餘，能夠常開演講會，而演講會中，倘又能如此去討論研究，那不但一堂相聚，各剖衷

懷，精神上得着愉快，並且實際工作上的集思廣益，功效可就更大了，兄弟今晚本有各方面的話要講，因為大家常常見面，對於一般的意見發表的機會很多，或是大家已多注意到，現在不必講了，祇講一點關於革命理論革命工作的話，爲同志目前就該注意的，自從北伐成功以後，我國居然在革命黨手裏統一了，這雖然可以慶幸的事，但現在尙非本黨黨員安閑逸豫之時，我們正要從客觀方面去留意黨的現在地位，是由那裏來的，是由過去的總理的領導，和諸烈士的犧牲奮鬥得來的，絕非偶然，我們有了過去的黨史，黨史上有了相當的成績，然後我們才能得着政權，而統一國家，過去既統一了國家，今後就要建設國家，這建國的責，我們便不能推卸，但是同時也要曉得這種責任實在不容易負，而且我們以一黨治國，比起別國有幾個政見，同時相對可以互糾過失，共督政府的，便責任更大，而做得好更難，我們不但消極方面照從規避責任，並且積極方面要真能盡了責任，在這一個建國的總責任中，最要緊的當然是領導民衆的一種責任了，所以以前經過許多犧牲，許多痛苦，由軍政時期遞入訓政時期，可算是我們既往已盡之責，從此再不辭艱苦，不避勞怨，領導民衆由訓政時期而早達憲政時期，又是我們當前待盡之責了。

我們應該如何去領導民衆呢？第一步先要教民衆認識我們，信任我們，是真誠的，而不是欺騙的。平常我們教兒童讀書，兒童如果不聽我們的話，不跟我們去做，甚且見了我們便哭，或者他們心上已有了主觀，覺得不讀書的好，那時我們可以用糖去騙他讀書，或是允許他讀完了書便可以去玩，但是我們去訓導民衆，可不能如此，而且事情也不是如此簡單的，我們在破壞時期，一時權變，容或用刺激的方法去喚起民衆，那是可以的，那是較簡單的事，現在那一套可不行了，因為民衆在過去十幾年中，已經受了痛苦，對於我們，正抱着莫大的希望呢，在軍政時期中，我們自己曾就最高的限度，對民衆發表過多少宣言，提出了多少政綱，至今尙未一一實現，民衆正引領而望，等待我們把從前發出的許多支票，一一照數兌現呢，當然，因為政治上的許多爲難，一時是不能攪好的，但是我們對於民衆的責任，民衆對於我們的屬望，在我們自己固爲不能丟開，在民衆也斷不會輕輕放過，而肯含糊了事的，那我們在訓政時期去領導民衆，如何能用一毫哄騙的手段，如何能存一點暫時徼倖的心呢，當然要腳踏實地，誠誠懇懇的去做，完全保持着我們的信用了，所謂政治，原就是關於民衆的事，何以在這個上面會發生困難，而教我們一時不能有志遠遼呢，一乃因為國內外的環境不好。凡事

不能由你快做，二乃因爲民衆的程度太低，能力不夠，一時推不動，況且有許多事，簡直非民衆自己向前求進不可的，如增加生產一件事，憑你制度方法定得如何好，道理勸導得如何透澈，農人工人倘若不發奮，各人兩隻臂膊倘若不肯多多用力，生產增加的程度是總歸有限的，我們既不能代替他們的臂膊去多多用力，我們對於國民經濟的十分發展，對於國民生活的長足進步，有何辦法致其速現呢，所以自治是很要緊的，人治官治，不如自治的澈底，自治一層，在我們國內，以前一直就沒有辦到，何況近十餘年來，兵匪相乘，民不聊生，喪亂之餘，一下子又如何能夠實現自治呢，說到裏這，話又說回來了，要民衆能夠自治，還非得由我們去費一番訓練領導的工夫不可，不過當開始訓練之前，要就我們以前向民衆已發表的宣言，目前爲民衆新確定的綱領，在我們今後逐步能力做得到的範圍以內，和民衆事實上那種急需，那種緩需的實在情形之中，預先言劃一個步驟出來，一步一步的替民衆做，莫教民衆做，莫教民衆一時奢望，而日後失望，尤其是無論計劃，無論實行，我們始終總是誠懇切實，完全爲的民衆，而不是爲的其它，不可有半點利用民衆的心思，更不可有一毫欺騙民衆的行爲，倘若說以前用許多宣言，在民衆面前誇下大口，又用許多力量，把民衆爭奪過來，今而後便悄

而息，甚麼都不提了，或是格外用民衆做個幌，以圖抓住政權，去遂自己的陰私，那斷斷不是本黨的用心啊。

第二步的領導民衆，我們要到民間去，並且深入民間，我們必得趕緊檢查自己的一切，是否已經民衆化，平民化，斷不可自己造出一個平民階級，而與民衆革命不相入，民衆的思想，原是直覺而不加深思的多，你心裏雖挾着一番精微遠大的計劃，要訓導他們，但是你的面目舉動，倘若有一種特殊階級情形，那對不起，他們一定要辜負了你的盛意了，譬如到一個村莊裏去做訓政時期的工作，斷不能仍舊是軍政時期的那一套貼標語喊口號，激烈的演說，命令式的指揮，就算完事，今後我們的生活，要完全與民衆同化，所說的話，要切合民衆的本身，農人，工人，商人，各有各的甘苦和願望，我們預先應該深切體會過，先合他們的心理，引起他們的同情，然後再慢慢的領導他們的意識到我們的目標上來，這樣一回兩回的先後教民衆與我們十分接近了，然後我們的計劃，才能十分與民衆接近，那知現在有一班同志，誤解了『黨權高於一切』的一句話，以為單獨黨員也能代表全黨，自己既是黨員，自己的權柄就高於一切了，於是一和民衆接觸，惟恐民衆不曉得他不尊重他有高於一切的權柄，馬上千方百計的擺起黨員的架子，

一舉一動，一顰一笑，幾乎都表示出與衆不同的黨氣，攪得現在內地有所謂『黨老爺』一個壞名詞出來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民衆對於黨員，惟有敬而遠之了，那裏還肯受他們的領導和訓練呢，幾十年前，我國人人不知道革命，人人不肯革命，在那時革命黨人是專門以革命爲職務，尙且不得人民的同情，不來參加革命，如今大努家力的是完成國民革命，革命要民衆化，革命已非少數人的專務，如何能獨自占據着他，成爲一種階級，何況國民黨提倡的革命是全民革命，全民革命中，絕對不許有什麼階級的，豈有自己反而獨成一個階級的道理呢，從前的時候，革命者在民衆之中，雖然分別得很明顯，而進行運動，對於民衆，還要力求平易，而不教民衆驚擾，何況如今，革命者應該做的民衆的事，民衆應該做的是完成國民革命的事，倘有一部分人以爲一切權利屬於自己以爲自己高於一切，離開民衆，那幾乎要做反革命了，還成甚麼做訓政工作的革命者呢，所以『平民化』三個字，在革命者看來，尤其在在訓政工作的革命者看來，意識實在極深，而作用實在極大，大家如果不能與民衆同化，與民衆同甘共苦，那就不必想盡訓練領導之責，而與民衆共謀建設的大業。

第三步領導民衆的方法，是鞏固領導的地位，使民衆對於我們，由信用而成

信仰，並且信仰日堅，而在我們領導民衆所要到的許多目的地之中，這也就是一個，到那時，真是民衆都革命化，而國民革命已底於成了，民衆自治的力量，行權的能力，已不必說，而憲政的康莊，就此踏上了，原來這所謂第二步是與民衆同甘共苦，第三步是甘比民衆來得少，而苦比民衆來得多，反而不能與民衆甘苦悉同了，第二步是革命者，不許成爲特殊的階級，第三步是革命者在犧牲方面，在吃苦方面，一種赴湯蹈火，奮勇當先的精神，又實在要超過民衆，而獨自達到一個特殊的度數才行，我們要知道，破壞是革命工作，建設也是革命的工作，軍政時期是革命黨的任務，訓政時期更是革命的任務，後面所需要的犧牲精神，實比前面所需要的還要來得大，如果以爲軍政時期的革命才要拚命，很危險，好得現在已經過去了，已到了訓政時期的革命，不要拚命，不要冒險了，大家樂得來做一個『太平宰相』一般的『太平革命者』，祇享受那革命者的美名與優遇，而實際上並不犯到革命者的危難，這種遭逢真是千載一時，可遇而不可求，世間美滿的事，便宜的事，更沒有及得上這個的，唉，那簡直是投機份子，腐化份子的心理，那裏是革命的心理，更那裏是建設革命的心理，革命那裏是這樣，建設又那裏是這樣，訓政時期的革命工作，又那裏是如此容易做的，我們又知道，從前

革命者在社會所以成爲特殊份子，究竟是那一方面且民衆不同些，享福的方面呢，還是吃苦的方面，當然是吃苦的方面了，一般民衆怕死，革命者拚命，一般民衆只打算及身的一世，革命者打算民族的將來，一般民衆留戀戀現在的人生，革命者嚮往理想的人生，所以就犧牲吃苦一方面說，革命者超過民衆所有的度數，在從前破壞時固然應該很明顯的，就是現在建設時，仍舊應該很明顯的，這種精神，就是我們今後在領導民衆之中，第三步所需要的，沒有這個。我們就是失了革命性，接着一定要失去導領的地位，雖然具了第一步的誠心誠意，雖然具了第二步的平民化，効用仍然不能長久，不能深刻，俄國共產黨可佩的地方，就是義務比非黨員盡得多，而責罰非黨員受得重，惟其如此，黨才能站得住，在民衆裏面，領導的地位，才能鞏固，意大利法蘭西斯蒂黨的理論，雖然不好，但是他們黨內指定三十萬黨員爲義勇隊，社會上一發生甚麼事件，他們馬上和軍警一樣的不顧艱險，犧牲自己爲羣衆謀幸福，而他們平日，並不與軍警得着同樣的給養，我們既以黨治國，既然去領導民衆，這種精神當然不可少，臨難固然要奮不顧身，就在平日也要比民衆多負責任，多担工作，多吃苦頭，嚴守紀律，嚴受制裁，嚴受懲罰，然後民衆對於我們，信仰自堅、追隨自順，而同化自速，及至全國

民衆都與我們同化了，便都是總理的真實的信徒，都經了黨國的切要的訓練，全體國民的自治何患不能做到，而三民主義國家，何患不能實現呢，所以我們今後去做民衆運動，簡直要從鍛練我們自己的人格入手，既是黨員，簡直要祇盡義務，不享權利，然後以這樣人格來激動民衆，而民衆跟我們動起來，並不是以我們的空言去激動他們，或以我們的手段去攪動他們，絕無所利用，絕無所假借，這才是本黨所需的民衆運動，這才是我們所以領導民衆，所以做訓政工作，所以努力建設，革命真正途徑，同志们，注意呵，接着來談談革命性，革命性是甚麼呢，並不是指性情暴躁，態度凶悍，舉動僻怪，手段毒辣，如是種種，革命性乃肯犧牲自己，而爲羣衆，這是最要的根本，從前有個俄國人問總理，革命的思想，從何而來，總理說，『從愛人來的』而總理平日又說，『革命是打不平』，因爲愛人的原故，遇到不平便不能不去打，去打不平，便要犧牲自己，這是革命性的最大的表現，在愛人，打不平、而犧牲自己之中，所包含的守正不阿，信仰主義，不遷就，不妥協，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威武不屈，都是革命性的表現，若對同志同事同胞吵鬧，衝突，發氣搗亂等等，那算甚麼一回事呢，從前汪精衛先生刺滿清的攝政王時，曾經用指血寫過一封信給兄弟，裏面有『個字說，『我今爲薪

，兄當爲釜』，他的意思柴在鍋下先燒起來，然後鍋中的米方有成熟爲飯的希望，不過單單有柴，米終無以爲飯，柴的作用甚烈，但霎那時，本身已燼，而鍋的作用既要具堅忍性，耐得煎熬到破了穿了也說不定，又要具傳熱力，能夠把生米變成熟飯，他去捨身暗殺，是去做了柴，而希望我們負擔一切艱苦不盡的革命工作去做鍋，彷彿是革命黨中的一段程嬰杵臼的故事，他先半年雖在民報上做了『革命之道德』一篇文章，最後一段就提出薪與釜的比喻，非常沉痛，感人甚深，其實那時兄弟接到他的血書時候，就在我們運動廣州新軍舉義以後，三月二十九以前，都只顧得自己做柴，並想不到誰能做事，這個比喻，如果應用到現在來，那就應該說，在破壞時期，大家都得做鍋，忍耐煎熬，把一粒粒的米，化成一粒粒向飯，讓別人來吃，自己只愛做鍋湯而已，從來只見鍋煮飯，鍋裝着飯，而不見有鍋吃飯的，這樣比譬，可以算是整個革命性的描寫了，當我們依照上文所述的三個條件，去做訓練工作，去領導去訓練民衆時，我們不要具有這樣所論的革命性嗎，將來儘管吃了大苦，而事情的成績，仍不能如我們所期的，那是意中之事，我們總得一一忍耐下去，而一心一意的再幹，幹到後來，幹成了，只有別人的，並沒有我們自己的，這是我們在未幹以前和既幹以後，心裏老早有着，並且

刻刻有着的觀念，並沒有第二句話說，並不輕第二個念頭，這種情形，就是我們今後在工作上，應該有的革命性的表現了，我們看總理的最後工作，在廣州時，自己率領軍隊到東江等處去打仗，仍舊做的是柴，一旦吳佩孚曹錕倒了，北方換個局面了，比較是個機會了，總理乃一人扶病北上，主張開國民會議，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就是做鍋了，不幸所志未伸，而已中道崩殂，試問總理一生可曾離開過做柴做鍋的地位，而想自己去吃飯的呢，誰不能說總理提師北伐是革命，扶病北征便不是革命，總理懷着早息內爭，早安民命，百端更始，迅圖建設的十二萬分熱誠，不辭艱屯，不計生死，扶病登程，繞道北上，一路不斷的宣示自己對內對外，澈始澈終的革命主義，與革命方略，這一段最後的崇高偉大的革命精神，凡我後死的同志，誰個能有，誰個能忘，誰不應感動激發，引為楷模，在本黨今後待盡的責任之中，照總理那樣的精神去做，以竟總理未竟之志，豈可以忽略了這種大的真的革命性、不去認識，不去培養，而轉被那種恣睢暴戾，叫囂驟突的淺薄行為所欣動，反而染上了反革命性，果然是總理的忠實信徒應該如此的嗎。

以上種種可算都是關於革命理論方面的話，現在再來談關於革命工作的話，無論中央與地方，現在所謂工作，都有黨部方面的，與政府方面的兩種，做這兩

種的工作，都不應該當他是自己的謀生，存心都該是為黨，為國，為社會的，因為這兩種工作，與別的不同，都是直接的革命工作，無論做甚麼工作，一定要講求個效能的增進，訓政時期是愈短愈好，推進民衆是愈快愈好，我們看看世界上的大勢，便知道甚麼都不容我們慢吞吞的牽延時日了，那麼做革命工作的人更應該如何的去求效能的增進呢，第一，我們以前工作中，不懂用科學方法，因而費時，費財，費力，各方面太不經濟，而效能不見其增進，兄弟常想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，要推中國人的最奢侈了，這句話聽來很可詫異，我們人民平時惡衣敝食，生活陋極了，人家工人住屋裏面，都有地毯，火爐，工人以上，更不必說，何以比起來最奢侈的反而屬諸我們呢，原來人家的奢侈，乃奢侈於用物，人與物比起來，應該那一樣貴些呢，當然人貴了，我們所奢侈的比別人所奢侈的根本來得貴，那得不算是窮奢極侈呢，何以說我們是奢侈於人呢，兄弟看見有許多同志，在國內平日用五六個人，還覺不夠的，一去歐美，連一個人都用不到，祇算用了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個人而已，而生活方面的便利舒服，絕非在本國用五六個人的所能比，外國的空間，非常經濟，無論個人或家庭，所占有的空間比較同等經濟力量的我國人所占有的，一定小的多，一間臥室，一間客廳，一間書房，連在

一處，所有整潔的工作，不一定要專僱一個人終日其事的，只要有人每天某時來一會兒就行了，此外生活所需，一舉手就可以得水，一彈指就可以得火，那裏像我國的生活，單單吃飯一項，廚夫以外，因為用水要一人去挑，因為用火又要一個人去燒呢，加以我們房屋的構造太散漫，交通器具太不完全，人的性情太懶惰，體格太衰弱，心理太好虛榮，而一方面又民生太艱苦，民智太低落，缺乏職業，生路太少，於是富有的，便放縱于用人的奢侈貧苦的便自儉於物，應他們的所求，而聽人奴使，往往一家上下，十餘人之中，只有主人一個是做正經事業，或是生利的，其餘都不過去適應或幫助他一個人生活方面的一切罷了，甚至連這一個主人也就在許多人中，生活生活而已，別無所事的，那也太平常了，於是我們民族以現有四五萬萬的人口，占着縱橫數千里的一塊大地方，子子孫孫，前前後後，已經忙千多年，而所有工作的效能與成績，反不及那人口土地的衆廣，文化歷史的長久，都只當我們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，豈不可恥可歎呢，這種浪費消耗不經濟的工作情形，還不由我們今後訓政時期的革命工作中，空閒時間，人力財力，怎樣才通通經濟呢，那就非一切都採用科學的不可。

第二，我們以前工作中，紀律太差，秩序太壞，因而顛倒重複，彼此力量抵